

← (上接2版)

改造：改为了天地万物生成之图。在“图说”中，周敦颐对这幅图的解释为：有象有形的二气五行和万物，都源自原始的、绝对的实体“太极”，而太极就是无极，由它而产生出阴阳五行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他以“太极”为自体，提出了宇宙观、世界观，说明了万事万物和人的产生，进而提出了无极、太极、动、静、性、欲、善、恶、仁、义等范畴和概念。

《周子太极图说》除了1876年2月写于德累斯顿的“前言”(共5页,V-VII)之外，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引言”(共10页,1-10)和“正文”(共70页,11-81)，另有作为“附录”的“朱子太极说”(共6页,82-88)。“引言”主要是对《太极图说》的思想加以总结和系统化，又包括了五个部分：

I. 二元论 1

II. 向一元论的过渡 3

III. 周敦颐的一元论 5

IV. “极”和“太极” 7

V. 朱熹和“性理” 9

这一共10页的“引言”基本上是一个中国哲学的简单背景介绍，这部书的读者显然是当时德国的一般读书人，他们很少有相应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

在第二部分“正文”中，包括了“导论”、周敦颐绘制的“太极图”及其德文翻译，以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原文及翻译，也包括朱熹的注及译文。作为附录的是“朱子太极说”，出自《朱熹文集》(明嘉靖十一年[1532]福州府学本/卷六十七)的“太极说”。由于这三个部分都被收录在了《满汉合璧性理》

之中，因此在甲柏连孜的论文中，除了中文之外，也都罗列并分析了满文，只不过满文部分是用拉丁字母撰写的方式给出的。

论文的最后两页是甲柏连孜的“简历”。

在汉学领域的首次登场

撰写博士论文时的甲柏连孜毕竟是26岁的年轻人，他知道在汉学领域他只是一个资历很浅的入门者。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他写道：“在拥有众多著名前辈学者的汉学领域，我好像是第一次登场，希望读到此书的当今衮衮儒能原谅我的无知。在东方学研究的领域中，汉学也许是至今依然很少为人开拓的巨大领域。”

在甲柏连孜所处的时代，从整个东方学的领域来说，汉学的确鲜有巨大的成就出现。我想这正是甲柏连孜之所以乐此不疲地进行汉学研究的原因。一直到1881年，他在“东亚研究与语言学”一文中依然表现了对德国汉学研究状况的担忧：

汉学在德国的发展并不顺利。我们在东方学的土地上耕耘的却是别的果实，甚至硕果累累！印度研究、伊朗研究、闪族研究以及埃及研究的辉煌成就纤毫毕现地呈现在这个文明世界眼前；我们看法老和他的臣民们、穆斯林以及婆罗门简直就好像是相识已久的生意伙伴或是手足同胞一样，恨不得



甲柏连孜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翻译和解说。

赶快称兄道弟，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历史就好像小时候听童话故事时一样。至于中国文化在这里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反正听着不像是人家本国的旋律。

跟其他德国的东方学研究比较，甲柏连孜认为，德国在汉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很差的，有待进一步提高。

哲学文本的翻译

在“前言”中，甲柏连孜指出，《太极图说》意义非凡：

周子的著作所涉及的是辩证思想的发展，甚至溯源到了二元论最初的单位：我认为这对于哲学专业的人来讲也是不无兴趣的吧，但首先我将我的这部文献给汉学家们。并非仅仅告诉汉学家一些新的东西，而是特别希望通过这篇论文更好、更清楚地阐明周子的体系，这对我来讲似乎也是可能的。因为我常常感觉到，第一次的翻译有多么艰难，其中甘苦儒莲在他的老子翻译中一定深有感触，语言专家多么需要其他方面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在修改方面的帮助。

甲柏连孜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汉学家，像周敦颐《太极图说》这样的哲学文本，仅仅从语文学的角度是无法翻译、阐释清楚的。因此他认为，哲学家的介入非常重要。

在此，甲柏连孜举了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翻译《老子》的例子。1842年儒莲将《道德经》翻译成了法文。1856年他又将法文本翻译成了英文本，送给他的英国老师、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甲柏连孜认为，作为《道德经》的第一个西方语言的译者，儒莲最了解翻译之难。因此，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翻译对甲柏连

孜来讲，同样是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

除了儒莲之外，甲柏连孜提到他的榜样应当是汉学家史陶斯(Victor von Strauss, 1809—1899)：

我想到了史陶斯，他的翻译艺术为我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榜样。他所达到的，是我追求的：将原作者的形式和思想尽可能予以忠实地再现。我会大胆地一再使用德语固有的表达方式，或者对意义不明确的篇章做多义的处理，以便尽可能客观地来看待不同的解释，并添加由我自己的理解方式得来的注释。在多种可能性的阐释方式之中进行选择的地方，我会在注释中让读者对出现问题的地方予以关注，以便引出他们的批评意见。

甲柏连孜所提到的是史陶斯的《道德经》翻译。这是第一个德文的《道德经》全译本，出版于1870年。史陶斯曾在爱尔兰根大学、波恩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直到1882年才在莱比锡大学成为神学博士。史陶斯如何学的汉语？跟谁学的汉语？都不太清楚。但是他受过很好的神学和哲学训练，他的译文被当时的学者奉为经典之作。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对史陶斯的这个译本予以高度评价：

史陶斯所作的注释在于把读者引向翻译中的难点问题，中文原句的意义以及词句的多种含义。此外，他受过传统的德国哲学训练，因此他的阐释透彻、审慎，有时也带点奇特的哲学味道。即便译文晦涩难懂，也能在注释中找到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使用这一杰出译本的同时，我还参照了其他新出的一些译本。在发现这些新译本跟史陶斯的译本有偏差时，再读史氏的注释，真令人信服不已，他会告诉你他之所以这么译的理由，并且常常是后来才出现的异议事先就能认识到。史陶斯这本乍读起来令人

费解的译本，也许正因为此才是最好的译本：这一译本不易读懂，需要借助于注释的帮助才能理解那简短、含蓄的背后所隐藏的真意。

在1959年出版的瑞士苏黎世版中，为这一新版作序的托恩(Willy Y. Tonn, 1902—1957)认为，史陶斯的老子译本不仅是最古老的德语译本，同时也是最好的译本。他同时指出，后来的很多德译本，包括卫礼贤的译本，实际上都是以史陶斯的译本为基础完成的。史陶斯在译本中不仅仅使用德国哲学的概念将老子的思想介绍给了德国的知识界，同时他也将老子的思想同西方的哲学家做了很多比较。在他阐释老子的文字中，就列举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1260—1327)与伯梅(Jakob Böhme, 1575—1624)等西方历史上的哲学家。我想，正是基于史陶斯译本的上述优点，甲柏连孜才将之奉为圭臬。

哲学文本的古代汉语阅读方式

甲柏连孜认为，从《太极图说》的“内容和形式来看，这些篇章更适合古汉语的初学者”：

正是为了这一部分的读者，我在前几页加上了很多语言方面的注释。我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首先让他们注意这些语法现象，在其后的阅读文献过程中，他们便可以独立地来观察这些现象了。一本印制出来的好的语法书，对于一种语言的新手来讲，并不能免除他们去做读书笔记，而此类工作通过对值得注意的地方的及时提示，(让阅读)变得容易很多。

因此，对于甲柏连孜来讲，尽管《太极图说》是一个哲学文本，但是他的阐释方式，依然是语文学的(philologisch)。显然，他的路径(Annäherung, approach)是从语言到哲学思想。如果不理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很难理解文本的真实含义。

究竟怎样才算是好的译文呢？甲柏连孜指出：“一部学术著作的好的翻译，要求专门词汇尽可能通过特有的、不过总是同一个表达来翻译。”但他认为，“对中国哲学术语的整体探讨，超越了我的工作范围”。因此，对甲柏连孜来讲，这样的一

(下转4版) ➔



1840年3月16日，格奥尔格·冯·德·甲柏连孜出生于阿尔滕堡的小镇珀施维茨(Poschwitz von Altenburg)。一战前，这里是阿尔滕堡-萨克森公国的首府。